

论中国现代军事文学的开山作

◆ 龙长吟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指中国新文学出现以来的军事文学作品。这里所说的新文学,不是指梁启超文体革命时期的文学,而是指以《新青年》创办为标志的思想、语言、文体全面革命以来的文学。这里所说的军事文学开山作,当然是早期作品。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发展可分四个时期:一,诞生期,即早期:辛亥革命后与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1924年郭沫若的《到宜兴去》开始到抗战前的军事文学作品。二,发展期:抗日战争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军事文学,这三次战争都是主体方被动接受的以弱胜强的战争,其间描写这些战争的作品数量不少,但质量一般。三,壮大期:和平与冷战时期,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从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开始,到新时期之前的军事文学,有全景化、史诗化的宏大叙事,也有《红旗飘飘》等个人回忆,因不敢表现战争的残酷性、人性、人道主义,繁荣而不成熟,故曰壮大期。四,成熟期:即新时期以来,从徐怀中的《西线无战事》开始到当下全球化时代的军事文学,其间的作品思想深邃,内容丰富,不回避矛盾,艺术上全面成熟,题材却有些枯竭。在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中,早期作品尚只有小说、散文(含传记、日记等)和抗战开始前的少量诗作,内容则包括军营、军旅、战争三大部分。影响较大的有郭沫若1928年收入《水平线下》的《到宜兴去》、《尚儒村》和1936年的回忆录《北伐途次》,谢冰莹1927年的《从军日记》,黑炎1929年的《战线》,孙席珍1929年开始写作并陆续发表、出版的短篇小说《火和铁的世界》以及战争三部曲《战场上》、《战争中》、《战后》,施蛰存1932年的《将军的头》,周文1933年的处女作《雪地》和1935年的《在山坡上》。此外还有1935年肖军的《八月的乡村》,1937年2月陈渠珍的《莽野尘梦》。因为以往的中国新文学史著均把丘东平的《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

斗遭遇》以及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①等抗战小说作为现代军事文学的标识性作品,本文亦将它们列入,作为讨论的对象。这些作品的共同意义是: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实现了现代中国文学审美对象的大转换。

由于新文学滋生于“五四”前后的思想文化革命而不是滋生于军事战争,发端期的新文学,即“五四”前后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白话文学,除新诗外,主要是知识分子小说、乡村小说、女性小说,现代军事文学作品并不多。只有经历过辛亥革命、参加过北伐战争、经受过“九一八”事变洗礼的少数作家才创作了少许军事、战争题材作品,其中不少作品依然带有知识分子小说、乡土小说的浓重痕迹。军事小说的出现,标志着文学审美领域的新的开拓,审美对象由农民、知识分子、女性到士兵的转换,证明了中国新文学的日趋成熟和多样。上述作品中,谁家的作品堪当现代军事文学的开山之作呢?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没有意义。因为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都要关注问题的节点。起始点涉及事物后来的走向,终结点决定着事物的命运结局,它们是事物最重要的两个节点。中国新文学是只有起点尚未终结的文学,弄清起始点便很重要。找出其中军事文学的起始点,并确定中国现代军事文学的开山作到底是谁家之作品,涉及后来军事文学正途的走向,系中国现代军事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然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并不能一蹴而就,前提是还得首先弄明白现代军事文学的范畴和开山之作的大致条件这两个理论问题。

先说军事文学的范畴。“军事”是一个包括军营、军旅、战争的三重组合概念。军营作为军队驻地,是军人日常生活和内部矛盾演化的场所;军旅,主要指军队的行军、训练、演习;战争,是军队存在的根本理由和最高价值,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军队就是为了

打仗。因此,描写战争是军事文学的核心和命脉。军事文学拥有四个要素:一,环境,包括战时环境和平时代军人生活、工作、演练的具体环境;二,对象,军事文学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物,但主体对象一定得是军队与军人;三,行动,军事文学的核心和命脉既然是战争,其核心当然是描写饱含军事智慧的军事行为,包括模拟战争和生死存亡的血肉之搏的行为极限;四,军事文学还要表现军人的精神与良心。四个要素中,第一个要素是泛要素,只具备第一个要素,也就是说只写了战时环境或和平时期军人生活小环境的,不是充分意义上的军事文学作品;第二个要素是必备要素,如果没有写军队、军人的生活与厮杀,根本算不上军事文学,更谈不上战争文学,最多只能算作“泛军事文学”作品;最后一个要素军人的良心与精神是充分要素,只有既写军队、军营、军人,又写了军事行为、军事智慧,还显示了军人的精神与良心的文学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充分的军事文学。我们把后三个要素称为军事文学的“真要素”。换言之,真正意义上的、充分的军事文学,一定要写出军队的军事行动,军人的智慧、精神与良心。这样一衡量,早期,充分意义上的军事文学作品就很少了。

再说现代军事文学开山作的条件。大凡开山作必须有一定的厚度、深度与高度,不是随便什么马马虎虎的作品就可以承担得了的。开山作不但出现的时间很早(当然不一定是最早),而且还必须是具有思想引领性、艺术示范性、历史标识性的文学范本。具体地说,开山之作的条件有:题材领域的开拓性,写作与发表时间的早期性,审美规则的启发性。军事小说的开山作应对战争的性质、意义有科学的认识正确的态度;有生动的军事场面、情节、细节描写;应表现出军人的精神与良心,为今后军事题材作品提供方向性、原创性的经验;作品具有文学史价值和原创的标识性意义。并非只要写在最前面的作品就是开山之作。用这样的条件和标准来衡量,肖军《八月的乡村》,以武装抗日为背景,只写了“在日本兵弹火下逃亡出来的一群”,全书没有直接描写抗日武装斗争,没有与日本军队做过军事较量,缺乏军事小说的核心内容,显然是战时“乡村”小说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小说。施蛰存的《将军的头》,写无法改变士兵贪财的本性而苦恼、因爱情而

迷茫、丢掉头颅的大唐花惊定将军,心理活动多,几乎没有涉及任何军事行动,是典型的以历史为题材的现代心理分析小说。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主要写一个落后农民受战争洗礼而转变,它顶多算作“间接地描写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这种间接的军事小说二三十年代不少,有孙俚工1926年民智版的以篇名为书名的短篇小说《生命的伤痕》,蒋光慈自称在“花呀月呀”声中“粗暴的叫喊”,主人公汪中最后死在战场上的亚东版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写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后来被列为禁书的中篇小说《短裤党》,以及同样遭禁的《少年漂泊者》之续篇的《鸭绿江上》,这些都是与军事题材相关联的文学作品,但都是间接的军事文学,不能以“开山作”目之。黑炎1929年的《战线》,虽也写到战争状况,但并不详实,而且作者对战争的根本立场不正确,不能担当开山之作的大任。周文1933年的处女作《雪地》和1935年的《在斜坡上》,虽然也是军事题材小说,但现在很难找到这个作品,实际上早就因时间淘洗而被遗忘。过早被遗忘的作品也是无法充当开山之作的大任的。

经过这种种比较后,可以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文学开山之作考虑的,便只有谢冰莹1927年的《从军日记》,孙席珍1929年开始写作并陆续发表、出版的短篇小说《火和铁的世界》及战争三部曲《战场上》、《战争中》、《战后》,1938年1月发表的丘东平的《第七连》和稍后《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陈渠珍1937年2月的《莽野尘梦》。这些作品具备军事文学的三个“真要素”,军事氛围浓郁,军事行动描写具体详实,战争生活的现场感强,系中国新文学早期为数甚少的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文学作品。郭沫若的《到宜兴去》、《尚儒村》、《北伐途次》,写的是江浙战祸与北伐,而且面世时间最早,理所当然地放在这里予以比较和论述。

网民把郭沫若的《水平线下》统称军事文学,那是不确切的。1928年5月上海创造出版部出版的郭沫若的《水平线下》,包括《到宜兴去》、《尚儒村》、《百合与番茄》等传记和《亭子间中》、《湖心亭》、《矛盾的统—》、《后悔》四篇小说。四篇小说以《水平线下》之名,于1992年10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郭沫若全集》文学卷第9卷。前几篇也以《水平线下》之名,收入199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郭沫若全集》第12卷

中。《到宜兴去》写于1924年,叙述奉命调查江浙战祸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遇所思所虑,是新文学中最早与军事相关联的文学作品。“宜兴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黑暗、路烂,臭不可堪”^②;老百姓为了活命,有薄产的卖家产,没家产的卖儿女,年轻一点的女子出去当娼妓、丫环、小妾。“广东财政穷绌得不堪,客军的湘军有时候几乎没得米煮饭”。作品以“我”当时的调查行动为线索,表现“中国江南农村一天天颓败下去”。“中国一天天地沉落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在第二年,即1925年写的《尚儒村》中,作者进一步坦陈“我在调查期中,除去认真地起过一次悲戚之外,我对于这些所谓‘江南的惨祸’,实在是淡然漠然的……这样的战祸,自民国以来已是司空见惯,原不限于江南。……其原因,一多半应归罪于我们国民自己。”这两篇自传体散文,还写到军阀鱼肉乡民,战后烧了好多房子,外国资本入侵中国工商业,工厂破产等事体,对于战争本身的情形却完全忽略了。与其说是军事文学,不如说是一部中国军阀混战时期的社会问题作品。同样,回忆录《北伐途次》,也是《郭沫若自传》的组成部分,写以作者为主的第三厅文化人,由长沙向武汉行进的实况,《小引》虽说了“叙述的是1926年北伐军进攻武昌时的事情”^③,可从未正面写过打仗。虽也批评了军官军事素质低,“连军事上的ABC都不懂,也在做师长”,但都是从文化人嘴巴里说出来的。作者是文化人,没有参加过战,“只能够根据着我所参加过的一部分写出”,“而且是根据着我日渐稀薄下去的记忆”,写出一些“片断”,主要是“汨罗江畔的露营,崇阳山中的跋涉,咸宁道上的奔波,宾阳门外的流血(也没出现过打仗的场面与细节——笔者)”。又由于文章意在“特别地纪念我的一位阵亡的朋友”,显然是文化人的传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军事文学,顶多也只能算作战争环境下的“泛军事文学”。这类作品还有很多,比如沈从文1927年于北新书局出版的《入伍后》中的短篇小说《入伍后》,1931年8月写于青岛的《从文自传》等。《从文自传》从《辛亥革命的一课》到末篇《一个转机》,百分之八十的篇幅都是写自己少年从军的生活,即十二岁参加军事训练,到十四岁前以文书之职随军行走于湘鄂川黔四省边境的情状。因没有真正参与打仗,便无打仗的文字,也都只能算作泛军事文学作品。

谢冰莹1927年的《从军日记》,也不是典范意义上的军事文学。1906年出生于湖南新化的谢冰莹,原是个敢为天下先的湖南精神的代表女性,她决不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昂首走进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尚未毕业又投笔从戎,20岁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进入八军政训班,经过短期训练,便前往北伐前线作政治宣传工作,曾经历过丁泗桥的恶战。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就是在战地写成的,最先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1927年军政学校女生队解散,这个“惊动全球的中国女革命先锋队,仅仅在短促的时间里像昙花般一现就消失了”^④,而《从军日记》却流传了下来。不过,从文学的角度说,《从军日记》用写给主编《中央日报》副刊的孙伏园的几封信件的方式,以日记体形式报告一个女兵的战场生活与观感,写的虽是“她生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题材高度新颖,但是着眼于“那里有男澡堂,还没有女澡堂”之类的生活琐事,内容单调平淡,艺术上也相当粗糙。当时有人赞扬写的“是整个的行军生活,是破天荒女兵的日记”,也有人批评“是随便写成的一些字,写了之后你一定没有修改过”。作者自己也毫不隐瞒地表示,“我的从军日记”,“这些不成东西的东西”,“太单调了!太没有生气了!太没意思引起人看的兴味了!”“无聊!真是太无聊了!写上这些没有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干什么呢?……我决不再写了。”这样的作品不但远远没有达到开山之作的高度,连《新文学大系》都没有将其收进去。

再看孙席珍的战争三部曲。《战场上》写北伐战争中五四九团第七连号兵邓强、马夫牛长根、“逃兵”刘克胜、上士黄得标等人的命运遭际,表现出明显的厌战情绪与反战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特别是学生兵刘长根,于战争空隙中偷偷回家看看久别的爹娘,硬被营长判作逃兵枪毙,批评了战争毫无人性与理性的残酷。《战争中》继续写黄得标、熊十一、裘上士、韦虎等普通士兵糊里糊涂的打仗,整整一个第四连,一次战斗下来只剩19人,“兄弟们为战拼命,救了‘国’,救了‘民’,却没有救到自己的命”^⑤。“只要自己没有死,便算是真的打胜了。”《战后》写北伐战争后,革命军变了质。三个作品当时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现代军事小说”,颇有开山之作的美誉。但是,这个“三部曲”布局显然是依傍托翁的《战争与和平》,缺乏原创性,思想内

容上单调贫乏,而且,笼而统之地厌恶战争,反对战争,有着非常明显的原则性缺陷。谁都知道,战争分正义与非正义两种。无论中外古今,无论哲人庶民,都赞成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区分战争正义与否之标准,则看战争的理由、目的和战争过程中是否葆有人性和理性。中国自古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伐无道”拥护正义战争。连主张“非攻”的墨子也始终支持反侵略的防卫性战争;坚决反战的孟子还提出了“仁者无敌(正义战争必然要胜利)”的思想;有西人甚至说“劣质的和平比战争更糟糕”。北伐战争是继承孙中山遗志、应南北人民之愿望,为结束军阀混战,统一国家民族,由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正义战争。可是,《战争中》却借黄得标的口说“为人民谋利益,为工农找出路”,“你们也相信这些鬼话!”^⑥“仗打完了,做官的做官,发财的发财,老百姓还是老百姓,我们还是我们。”(据湖南省图书馆藏本,1937年上海中华书局再版的《战争中》,未作一个字的改动。)而当时的日本正虎视眈眈地瞄准了中国。田间1938年的诗是这样看待战争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两相比较,作者对战争的态度和立场便一目了然。被鲁迅称为“诗孩”的孙席珍北伐时虽然担任过连、营指导员,较早发表了诗歌,但在小说艺术表达上却平淡、平直。战争三部曲比较多地写到了士兵们为了生存,为了每月一点饷银而从军打仗的战争心理,但那种茫然无助的心理与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几乎完全绝缘。在场面描写方面,小说反复呈现的多是士兵的战死与受伤,士兵各种各样的死法,死前的挣扎,死后的姿势,展示得特别详细,非亲见者不能为。1929年写于上海的短篇小说《火和铁的世界》表现了明显的反战思想和厌战情绪,“这仗要打到几时才得息呢”^⑦。场面描写上则是,“血肉模糊凝成散乱的一堆的,被截去了头颅手足的,大煤炭似的,烂田里的田鸡似的,四肢摊开如一大字形的,在山头山脚到处点缀着”。《血和火的世界》实际上是后来的中篇小说《战场上》、《战争中》的雏形,其中的思想、人物、场面都分别出现在后来的两个中篇小说中。尤其是各种死状,写得多了,便显单调、重复。就思想倾向和艺术造诣而言,孙席珍的战争三部曲也是担当不起开山之作的名分的。

真正意义上的充分的军事文学的开山作,应属丘东平的《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和陈渠珍的《莽野尘梦》。丘东平的《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具体生动地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官兵英勇作战的事迹,高度赞扬了他们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情怀,作者又是新四军时期的著名作家,新四军军内文化艺术领导人,牺牲时手里还抱着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手稿《茅山下》,所以,迄今为止,所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著、教材,都把丘东平的抗战小说作为中国新文学现代军事文学的开山之作。可是,经过反复比较,笔者发现,这个结论并不准确。首先,丘东平《第七连》的面世时间,在陈渠珍的《莽野尘梦》的后面。陈渠珍的《莽野尘梦》出版于1937年2月,丘东平高峰期的作品——在武汉创作的《第七连》,最先发表在1938年1月《七月》第二集第6期上,属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而不是早期的军事题材小说。由于丘东平曾是胡风的亲密朋友,是胡风《七月》杂志的重要作者,在胡风受屈的年月,所有的新文学史著,为了回避丘东平与胡风的关系,不是依据《第七连》在《七月》杂志上发表的时间,而是根据《七月文丛·丘东平集·第七连》于1940年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的时间,更是把丘东平的军事小说作为散文或报告文学,纳入40年代的抗战文学序列,时间上往后推了两年以上,这是学人们有意弄错的。查阅现存的《七月》杂志可知,《七月》于1937年9月在武汉创办,开始是周刊,10月改为半月刊,在武汉办了18期,武汉失守后迁至重庆。现行的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大都不顾这些史料,故意把《第七连》定为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即便如此,1938年1月面世的《第七连》仍然比陈渠珍的《莽野尘梦》晚了十一个月。在《第七连》后面发表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为期更晚了。质量上乘,面世时间早晚便成了决定开山之作的重要条件。

而且,更重要的是,陈渠珍的《莽野尘梦》,在内容的丰富、思想的厚重与艺术感染力的强烈诸方面,也优于丘东平的《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这两个作品。如前所说,开山之作必须是具有思想引领性、艺术示范性、历史标识性的文学范本,陈渠珍的《莽野尘梦》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该小说几乎囊括了现代军事文学成熟期全部重大理论问题并作出了科学的回

答。两相权衡,《芄野尘梦》似乎有充分的资格充当现代军事文学的开山之作。鉴于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还不知道有陈渠珍的《芄野尘梦》,下面,笔者将较为细致地分析介绍这个作品,让事实本身说话,看它是否有资格担当现代中国军事文学开山之作这一重要的历史地位。

首先,《芄野尘梦》对正义战争明确予以肯定。1909年,英国当局支持西藏地方武装发动叛乱,企图把西藏拉出中国大家庭。陈渠珍作为中级军官,随清军入藏平叛,领导和参加这样的战争是应当肯定的,后来,当平叛战争节节胜利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国家政权更替,平叛清军内部哗变,杀了原清军统帅。一时间,本来是讨伐叛逆的正义的“王师”变成了被讨伐的非正义的“贼军”,进而清朝垮台,“贼军”又变成了一群无名、无主、流落异地的“丧家之犬”。作品的主人公和当事人,虽然没有参加反清之战,但也没有贬抑之词,而是在承认现实的前提下,把湖湘子弟兵带回家乡。爱子弟兵,爱家乡,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在艺术上,作品将主人公真实地置于特殊的历史尴尬境地:清朝政府还存在时,他们作为国家军队前往边陲平叛,维护国家统一,无疑是正当的;革命力量把清朝政府推翻后,入藏清军本身的存在没有了历史的合法性,反而成了革命新军镇压的对象。这种历史尴尬境地是历史的偶然因素与必然性高度融合,展现它增强了历史的神秘色彩和小说的文学性,无形中也增加了作品的历史认知价值。

其次,小说真实地描写了作者亲自率队参加的平叛和撤离过程中种种军事史实,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难得的、稀有的军事传奇。由于作者的亲历性,作品所写战争和战斗,场面、细节,其形其境,历历如在目前,有很强的现场实感,详细、生动、逼真。特别是撤离中,七个多月与人间隔绝,断粮断信、九死一生、艰难险阻,种种困苦行状,非亲历者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作为战争传奇,其中的军人的种种生活及其体验,都是从来没人经历过的,许多惊险奇特的细节,极为宝贵。在那高度干燥、寒冷的沙漠荒原上,竟然留有亿万年前死去的巨型野兽的一个头颅。那头“高约五尺,大亦如之。大漠奇寒,久而不腐。风吹日炙,遂自僵枯。狼牙虽利,终不能损此金刚不坏之躯壳”。“堆积柴薪燔之,

且频频浇水,经三小时,唇皮离骨寸许,他处仍不可拔。又以数人更番敲剥,得八九块,巨如掌,以大火煨之,经两昼夜,始稍柔软,可施刀斧,皮厚二寸许矣……味较鲜肉尤佳。”^⑧小说还记录了人与狼争食的情景。至羌塘,人和狼都极端饥饿,军人杀一骆驼为食,派六人更番守护,以防野狼。至夜,竟为狼衔去双脚,守兵趋前与狼争夺,群狼不退,反而又来了十余头。鸣枪吓之,终于还是被狼夺去一腿。这些描写,无疑是现代军事文学中的瑰宝。一般说来,根据二手材料创作的,或由当时位置低、视野窄的一些战时文化人所写的军事文学,于战争本身总有点“隔”。陈渠珍的《芄野尘梦》和后来曲波的《林海雪原》,作者都身居军中主位,与写作对象合体同一,才达到了真实性与传奇性的高度融合。

再次,《芄野尘梦》始终洋溢着军人固有的死而后生的求生意志和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主义精神,谱写了一部少有的生命传奇。这也是战争文学作品的精髓。所谓英雄主义,就是精神的无所畏惧,生理体魄的强悍勇健,业绩的不同凡响。这是军队、军人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精神。战场是生命的演练场与角斗场,充满着刀光剑影的拼杀,血肉模糊的斗争,军人在这种文化场里滚打,英雄素质不是外在的要求,而是内在的生长因素。军人的文化基因,就是英雄基因。基因是自体繁殖、自我遗传的一种质素,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借助政治工作,将英雄基因发挥到极致,英雄主义成为现代中国军旅小说的基本精神和思想基调。中国当代军旅小说几乎都是英雄谱,每一部小说中都有英雄在闪光,而且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阶级品质的形象代言人。然而,一个只讲英雄主义、不讲人道主义的民族必然沦为野蛮的民族,一个只讲人道主义、不讲英雄主义的民族必然懦弱无能,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英勇杀敌与军人良心是并行不悖的一种精神的两个方面。《芄野尘梦》在高扬英雄主义的同时,高度肯定了军人的求生意志,高度张扬了军人作为人的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无论是腊左之危、昌都之险,还是青海之难、沙漠之困,每临绝境,激起的都是军人脱险求生、回归复命、绝不言败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超越生命极限的生存本能。小说重点描写了军人在绝境下,如何将生命能量发挥到极致,达到生还故土的目的。陈渠珍与藏女西原率领的115名湖湘子弟兵,误入酱通大沙漠,断粮七个多

月,茹毛饮血,与狼争食,历时225天,死110人,终于留得7人生还。显然,《芫野尘梦》中军人的英雄主义精神不是高调的,它与实实在在的求生意志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最崇高的精神与最起码的人性的集结,深入到军人的每一根骨头、每一滴血液、每一个细胞、每一窍毛孔中,军人的英雄主义也便从小说的每一个文字中跳将出来!就是凭借了这种崇高而实在的精神,他们虽经“九死”而能“生”。小说在描写军人的生命传奇、彰显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还详细记录了那个年代西藏少数民族特异的风俗习惯,描写了人迹罕至、人所不知的最偏远的西部风光。《芫野尘梦》于1940—1942年在《康导月刊》上连载时,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亲自为书校注。在“弁言”中高度评价说:陈渠珍的《芫野尘梦》“既奇且实,实而复娓娓动人,一切以康藏诸游记最。尤以工布波密及绛通沙漠苦征力战之事实,为西陲难得史料。”“比之《鲁滨逊漂流记》则真切无虚;比之张骞班超等传则翔实有致。”^⑩这些独特经历引出了回肠荡气的军人的感伤,为纪实性军事小说注入了灵动之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军事小说的奇葩。

作为军事传奇,《芫野尘梦》特别强调了军人的良心。陈渠珍在《军人良心论》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有良心之人拿枪,才是军人,没有良心之人拿枪便是土匪。”^⑪他反复申说“良心,生是随身带来的。在生一天要兢兢业业的保持住,不许有一刻功夫失掉,一直到死的时候。要完完全全带回去,才无愧屋漏,无忝所生。所以,良心是‘全受全归’的,不是时存时亡的。”^⑫张扬军人的良心,是自古以来军事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文主题。不错,战争的内核就是杀人胜利;但是那要看,杀的什么人。是滥杀无辜甚至屠杀俘虏,还是杀各为其主的战场上的生死对手?曹操的煮酒论英雄,体现的是他“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一人负我”的良心泯灭的英雄观、军人观。陈渠珍则相反,他的《芫野尘梦》多处写到,军人要有鲜红的良心。陈渠珍率部东归途中,在沙漠中走不出去,一切可食之物皆已断绝,其中有士兵建议,杀掉藏族向导,解饥渴以自救,遭到了陈渠珍的痛斥:外族同胞,年纪正轻,对我们有恩,“我负心劫杀之,世有鬼神,岂能容?世无鬼神,亦安忍?”^⑬可见陈渠珍是兼具良心与血性的勇者与仁者。

军事文学作品肯定军人的良心,就是肯定人性、人道主义。那时的陈渠珍就能旗帜鲜明地张扬人性、人道主义,说明正常人的正常人性是古今相通,中外相通的。阅读《芫野尘梦》,让人感受到一种真实的人生,让读者自觉洗涤自己的灵魂。

《芫野尘梦》的人道主义在作者与西原的爱情传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箫与剑、英雄与美女,历来是军事文学最出彩的写作范畴,《芫野尘梦》也不例外。陈渠珍是一个既有良心又极重感情的军人,因而成就了作者与爱妻西原的爱情传奇。西原本是个善攀援、晓骑射的十六七岁的藏族少女,收复工布后两人结缘,从此生死相随;东归途中,西原和陈渠珍两人厮守着终于逃出了大沙漠到达西安。后西原害天花在西安死于陈渠珍的怀中,葬雁塔寺。陈渠珍痛哭流涕,万念俱灰,好久不能平复精神的伤痛。回湘西后,陈渠珍始终把西原作为第一夫人供奉,原配夫人的住房和名分总是空着。汉代昭君出塞,嫁给匈奴的领袖(单于),开启了民族联姻的友好历史。唐代的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首创汉藏联姻的千古佳话。陈渠珍与西原,虽是中层人士,身份不及汉唐的公主与少数民族领袖的地位高,但他们两人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悲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悲剧情景透露的崇高精神尤其感人至深。这饱含着幸福与血泪的爱情传奇,也是汉藏联姻的又一段历史佳话,具有不朽的价值与文学意义。回族作家马丽华称:影响藏汉关系的有两个重要女人,一个是历史上的文成公主,另一个就是现代历史上的藏族女子西原。这一见解极为深刻。文学史上虽有不少诗歌、戏剧描写昭君和文成公主,但那都是后人写的。而西原与陈渠珍的爱情传奇,却是由活着的当事人自己以血泪的文字亲笔书写,因而更加刻骨铭心,撩人肺腑!黄永玉在陈渠珍的墓前塑的西原的青铜雕像紧紧地偎依着丈夫的墓碑,这是对《芫野尘梦》中近现代中国汉藏婚姻传奇的外化、具象化。说来也巧,2012年将陈渠珍的骨殖由长沙明阳山公墓迁入家乡凤凰南山时,在迁灵仪式上,“当装着遗骨的木箱放进墓坑的那一刹那,从墓坑里突然飞出一黄一黑两只蝴蝶来,它们翩翩起舞,在墓上空盘旋数秒,双双飞进南华山的大森林中。在场的人看了,无不感到神奇至极”^⑭。《芫野尘梦》这部难得的爱情传奇,也是一曲美好人性、

美丽人道主义的美妙的颂歌。

陈渠珍的《莽野尘梦》不止是军事传奇、生命传奇、爱情传奇、军人精神与良心的颂歌,还是一首民族团结的颂歌。小说虽然只有七万多字的篇幅,其容量却不亚于一部长篇,它的主题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义的。它在肯定军人的英雄主义和生命至上的同时,还具有民族的、历史的、爱国的意义。作为历史小说,它以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辛亥革命)前后一年间西藏发生的历史事变为描写对象,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特定事变最富有时代的内涵与历史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说,《莽野尘梦》还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小说。陈渠珍领兵远离家乡,奔赴西藏边地抗英平叛,无疑是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壮举;清朝政府被推翻后,作为曾经被派遣的国家军队的重要一员,陈渠珍并没有站在清廷的立场上与革命新军为敌,而是率一百一十五名湖湘子弟兵,迅速退出政治漩涡,撤离西藏,毅然回归家乡故里。热爱家乡是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陈渠珍面对历史变局的道路抉择,也是军人爱国主义精神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表现。此外,《莽野尘梦》蕴含着深刻的民族团结的意义和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不但写了陈渠珍在西藏平叛战斗中与当地藏民的友好关系,写了撤出西藏过程中藏族人民所给予的物质援助和派向导的实际支持,尤其是通过写与藏族女子西原的忠贞不渝的爱情,歌颂了两族人民真诚的友谊和世代交好的关系。小说所昭示的民族团结的意义,是中国现代军事小说传奇之作《莽野尘梦》的又一个贡献。

作为新文学现代军事小说的开山作,《莽野尘梦》这部小说的确涵盖了当下人们对军事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美学期待。从外在的场面、细节、情节、形象,到内在的精神品质,准确地回答了今天军事文学创作中重要理论问题。不仅对战争性质和写作立场有正确的把握,还对军人的精神与良心、生与死、勇与谋、英雄与美女、国家、民族与军人、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之关系、军事小说的要素等理论范畴,作出了精辟的解答。小说隐含着这些理论问题的答案,对今后我国军事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今天,笔者将这部作品慎重地予以判定,不仅只关涉到一部作品的价值,而且在对新文学名著的发掘、对军事文学创作及其今后的理论发展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还有一件小事,附

带提一下:周强在湖南担任省委书记期间,曾建议将《莽野尘梦》改编成影视作品搬上荧屏,这反映了一个读者对《莽野尘梦》的喜爱,反映了这部小说的意义越来越被人们所认知。

最后,介绍一下《莽野尘梦》作者陈渠珍和小说的成书情况。画家黄永玉撰写的陈渠珍的墓志铭是这样说的“先生是卓越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国内军阀混战时期,由于先生的精心维护……湘西百姓得以享受30余年安宁太平日子。抗日战争初期,上万湘西优秀子弟浴血献身……都是先生几十年一手培养的骨肉勇士……先生治军仁、为政宽、工作务实,教子有方,生活简朴,博学渊雅,见解宏阔,无愧人称山水精英。”^①当时的湘西,包括了今自治州、张家界、怀化市全境和常德市、邵阳市一部分的小半个湖南的版图。陈渠珍是一个地道的军人,他1903年入湖南武备学堂,毕业后在新军第一标任队官,宣统年间随新军协统钟颖入西藏抗英平叛,民国时期回湘西历任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副总指挥,湖南第一警备军司令,新编陆军34师师长,湘西绥靖公署主任,新六军中将军长,中央军委中将高参。他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统领湘西30余年,力行民族自治,注重民生,同情支持共产党,与贺龙义结金兰,1949年任湖南和平自救委员会副主任,湘西迎解放第二纵队司令,响应程潜长沙起义,发起湘西、凤凰和平起义,由毛泽东亲自签批,列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增选为全国第二届政协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还是一位政治家。他热爱文学艺术,不但资助黄永玉学画,培育沈从文搞文学,他自己也写诗、写小说,黄永玉把文学家界定为陈渠珍的第一身份,意在强调他的文学贡献,是很有眼光的。陈渠珍的《莽野尘梦》成书于丙子年除夕,旋即于1937年2月自序出版,1941—1942年在《康导月刊》上连载。时隔63年后,1999年西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后由重庆出版社再版,2006年3月中国广播出版社又一次出版。精品是可以穿越历史与地域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宣称:在我国新文学史上,陈渠珍的《莽野尘梦》,是中国现代军事文学的开山之作。新文学评论

注释:

①新文学早期现代军事小说,笔者不知道的也许还有一

些,敬请方家教诲。

②《郭沫若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页。

③《郭沫若全集·沫若自传》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④谢冰莹《写在后面》,《从军日记》,春潮书局1928年版,第59页。

⑤孙席珍《战争中》,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版,第130页。

⑥孙席珍《战争中》,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版,第32页。

⑦《孙席珍小说选集·火和铁的世界》,香港南方书屋1984年版,香港年丰排字所承印,第220页。

⑧陈渠珍《艮野尘梦》,中国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

101~102页。

⑨陈渠珍《艮野尘梦》,中国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⑩陈渠珍《艮野尘梦》,中国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⑪陈渠珍《艮野尘梦》,中国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⑫陈渠珍《艮野尘梦》,中国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⑬姚子珩《黄永玉的故乡情》,《书画精粹》2012年第10期,第9页。

⑭姚子珩《黄永玉的故乡情》,《书画精粹》2012年第10期,第9页。

本刊稿约

《新文学评论》是中国新文学学会主办的大型学术集刊,是国内外学者发表中国新文学研究领域的原创性学术论文的园地。本刊鼓励学术自由与学术创新,欢迎广大作者踊跃投稿。现将投稿的有关要求作如下约定:

1. 来稿应包括:①文本打印稿(采用A4幅面稿纸);②电子文本(采用Word文档格式)。编辑审稿以打印稿为准,编辑部收到作者寄达的打印稿后,即开始审稿程序。

2. 为了便于审稿,来稿的形式必须符合以下要求:来稿内容依次为标题、正文、注释和作者简介。论文中所有引文都必须注明原始出处,注释采用文后注。作者简介请注明作者的有关信息,特别是各种联系方式。如来稿属科研立项的成果,请提供该科研项目的有关信息。

3. 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数据库收录。本刊付给作者的一次性稿酬已包含文章著作权使用费及收录稿酬。如作者不同意论文被收录,请于来稿时申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4. 请勿一稿多投。来稿三个月后未收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因人手有限,本刊一律不退稿,敬请谅解。

本刊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邮政编码:430079

电子邮箱: xwxpl@sina.com